

# 善用媒体的清末江南善士

■ 徐钧 陈雁雁/文

## 首倡义赈

### 改变“官赈”一统天下的局面

李金镛,字秋亭,号丽卿。出生于江苏无锡的他最为人熟知的身份,是实业家、清官和外交家,也是清末著名的慈善家。他成长于乐善好施的商人家庭,年少时就从事慈善活动,后在救荒义赈中的卓越贡献而成名,因能力出众为李鸿章赏识,转而从政,由此边做官边做慈善,从苏北到山东,由天津到长春再转到漠河。

李金镛致力于“义赈”,亲赴一线,奠定民间救灾的模式和规章,救活许多百姓,在全国产生巨大的影响。李金镛最为人称道的慈善事迹是在“丁戊奇荒”中的赈灾工作,他首倡“义赈”,并且在赈灾过程中做出杰出贡献。赈灾时当地百姓感念李公恩德,称其为“李青天”“李慈父”。在传统的救荒体制中,“官赈”一直是主流,但弊病甚多。“义赈”,是指与官赈相区别的,由民间自行组织劝赈、自行募集经费并自行直接向灾民发放救灾物资的“民捐民办”赈灾活动。如研究者评价,晚清的义赈不仅改变了自古以来官赈一统天下的局面,也为百弊丛生的传统救荒体制带来了新鲜气息。光绪二年(1876),苏北一带的旱灾引发了蝗灾,灾民饥不择食,官赈已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。初冬时灾民流离失所,惨不忍言。据记载,不下二十万的苏北灾民纷纷流亡到南京、常州、苏州、上海一带觅食。于是江南本地士绅在本地设厂留养难民,筹措棉衣发放给灾民。李金镛一方面参与到赈灾活动中,一方面有感于老幼灾民行动不便,不能出走走觅食,遂萌发出携款赴灾区放赈的想法。他赴上海与胡雪岩等商绅协商,筹措资金,召集同道十多名善士,携赈银十三万两赶赴苏北灾区。到了灾区后,李金镛采用先师余治的做法,绘制图例,遍告灾民。他冒着疫病的风险,会同本地正直绅士、地保,逐户清查统计,随查随放赈灾款。历时五个多月,终于解灾民于倒悬,李金镛成了赈灾群体里的风云人物,时人评论说义赈先是在东南地区行动,后来又出境到其他各省赈灾,实以李金镛在淮海打的第一仗为先锋。

李金镛在苏北办理完赈务,本可以返回江南。但他并没有停止脚步,而是与同道一起直接赶往山东青州一带继续赈灾。李金镛自筹赈银十余万,亲自发放赈银七八十万。在当时参与赈灾的诸多队伍中,李金镛带领的“江广助赈局”人员多,资金雄厚,办赈得法,因而成为山东赈灾的主力。李金镛总结办赈经验,制定了《海州查赈章程》,奠定了晚清义



位于漠河县金沟林场西部山腰上的李金镛祠堂

赈的基本原则,成为以后各省开展义赈的范本。作为完整规范的工作流程,其规定了查户、放票、散赈等主要环节的做法。例如规定查户怎么使用印票,存根怎么装订,人口如何登记等。此章程细致严密,最大限度防止了舞弊的可能,具有极强的操作性,一直沿用至民国初年。

在东赈期间,李金镛在山东青州设立江广赈灾局,作为领导青州府各属赈务的总机构。同时在下属几个县设立分局,分派义赈同人主持各局工作。同时他考察青州地形,向地方政府提出了以工代赈、疏浚小清河的建议。这种思路在义赈史上也具有特殊意义。

相对于部分灾区士绅消极漠然的态度,或者趁灾荒巧取豪夺营私舞弊的负面表现,以李金镛、谢家福等为代表的江南士绅冲在义赈救灾第一线,他们的努力既解决了一部分社会问题,又为后来的赈灾工作指明了方向,某种程度上也抵御了传教士和西方文化的侵入。

### 将江南善堂向北方推广参与社会治理

第二次鸦片战争后,天津被辟为通商口岸,社会救济需求相应增加,原有的救济设施更显杯水车薪。当时,综合性善堂以其方便士绅阶层参与社会公共事务,能够解决各种社会问题,在广州、上海等沿海城市兴起。尤其是上海的同仁辅元堂、果育堂等善堂,不仅在解决上海本地社会问题上表现出色,在组织对华北灾区的义赈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
光绪四年(1878),众多灾民流入天津城内,李金镛倡议从赈款中拨出万金,在天津境内“创设善堂,名曰广仁”。并进一步筹措经费,近代华北地区最有代表性的社会救济机构——广仁堂,在各界的赞助下开办起来,这是把江南的善堂善会向北方推广的开创性举动。从机构设置来看,广仁堂“分设六所:一曰慈幼所,收养男孩,初时则为涤垢治病,继则分拨各所授事。二曰蒙养所,设义学整斋,择聪俊者,延师课读。三曰力田所,于堂之左右购置地亩,种植木棉稻黍菜蔬,择笨者雇老农教习。四曰工艺所,择不能耕读者,令习编藤织席刻字印书,俟年长业成,听其出堂自谋衣食。五曰敬节所,收养青年节妇及无依幼女,无家可归,俟长成为之婚择配。六曰戒烟所,广延良医,妥置方药,疗治鸦片瘾病,俾吸食者有自新之路庶烟禁不致徒设”。广仁堂的最大特点是“于读书、农工加意焉,务俾一人有一人之事,渐冀自能谋生”,即教养并重,身心兼教。在广仁堂创立时就认识到选择管理人员的重要性,希望通过提供优厚待遇来提高管理人员的积极性。但在实践中,广仁堂“所有南北办董董事,不领薪水,仅领车马费数千文,以襄善举”,只有具体办事人员发给全部薪水。为了取得众人的信任,晚清各社会救济机构一般都将经费收支情况,以征信录的形式公布。它详细列出捐款人的姓名、捐款数额和各项公费支出细目,表示经办人涓滴归公,以昭众信。广仁堂也不例外,接受官府和社会各界的监督。广仁堂运作有序,成绩斐然,远非一般施金

唯小腰辨米罐頭減元級紅結小瓜皮帽髮髻元色  
惟官難善拜書無地方月日本局訪查彈備云是蘇  
海州查賑章程 ○光緒二年江北旱災十  
老弱必致率院因神濕十謀於江君雲泉胡君雲  
帶童子民奈臨野莊小山楊鐵匠朱壽隆尹銀壽諸  
境東鄉人熱起都大能拾柴日數十起高燒鎮一帶  
借諸君馳赴高燒察看見此形勢而相聞道八  
賑之多寡先為酌給或二三百文至千文不等仍付  
賑章也誠善阻止更思賑務之不振由於州縣委之  
昔從孝忠余師查賑無不親在親故從未釀成事端  
多少作戶之準則所以小康之家無一不感極  
賜而宿遷而海州而瀋陽而山東儼破官賑之範圍

### 李金镛指定的《海州查赈章程》

济贫组织可比,是江南士绅在华北地区办得最为成功的一大善事。其模式被盛宣怀在华北地区推广开来,形成京都广仁堂、烟台广仁堂等一系列善堂。李金镛在长春任职期间建设书院,这也是开创性的动作。历史上长春的文教十分落后,历届官员从不重视文化教育。李金镛上任之初深感书院缺失,无法培养人才。要培养人的见识,一定要阐发先儒之学,兴节义之风。因此要设立书院。遂于光绪九年冬,李金镛与当地士绅共议捐建书院,并自己捐俸银千两作为创建经费。于次年(1884)三日兴工,同年8月落成,名曰“养正书院”。这是长春第一所官办学校。养正书院包括考棚、号舍、讲堂、藏书室等,藏书室皮藏图书数千卷。次年又续建十一楹生童学舍。李金镛曾亲自来书院给学生授课。光绪中叶吉林形成建立书院之风,实与李金镛建立养正书院的影响有关。1883年,李金镛回乡探亲,发现原有的洛社大

桥已毁,运河上仅有狭窄的木桥,过往行人拥挤不堪,且常有落水溺死事故的发生。于是他将自己历年官俸积蓄和多次因功所受的巨额赏赐共计7万多两毅然捐出,独资修建洛社大桥。大桥于1886年建成,造福一方百姓。

### 善用媒体传播 转国家场域为社会场域

李金镛所处的年代,变革之轮正携着西方的商业文明和价值伦理隆隆开来,官僚阶层依然承担着维护和改良制度的艰巨使命。虽然如今的公益慈善组织的生存环境已经大相径庭,但是考察李金镛在经营慈善事业的过程中所体现出的多重力量,还是很有现实意义的。

和以往所有的救灾不同,李金镛在丁戊奇荒的义赈过程中,得到了《申报》的全面报道和支持。《申报》是中国第一份现代意义的商业性报纸,社会新闻是其最主要的关注点。而《申报》报馆在上海租界内,其报道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客观性。当时,这份报纸创刊还不过四五年光景。

《申报》的巨大作用体现在:1.《申报》对灾情和造成的后果进行了集中报道,使读者及时了解情况。2.在资金捐助方面,李金镛在《申报》登载《劝捐山东赈荒启》,号召绅商善信,踊跃输资。3.对于社会各界的救灾行动,包括李金镛在山东的行动,《申报》进行了跟踪报道。透过报道,远在上海的读者知道,李在山东放赈前后历时三个月,共赈灾灾民26万多人,这也进一步促进了捐助行动。4.《申报》对灾害的成因、救灾的经验、灾后重建、如何防灾做了深入地探讨,这对于当时的救灾活动也是开创性的。《申报》这个当时的新媒体充分发挥优势,向社会各界提供了及时而真实的信息。从披露灾情,公开真相到劝谕民众、广造声势,最大限度地动员起社会公众的参与热情,触发了大规模义赈在山东展开。可以说,光绪初年的山东赈灾整体由国家场域转为社会场域,由官方话语转为民间话语,《申报》的媒介传播起到了相当关键作用。现代的公益团体更离不开传播这一重要环节。如今的传播渠道多样,速度更迅捷,可以采用的手段也更丰富。在这方面也有了许多成功的先例。但是我们可以观察到,很多公益机构在埋头做事之余,因为观念原因或者囿于客观条件,并没有很好地借助媒体的力量。或许我们可以从李金镛的案例中汲取经验和能量,让我们的公益事业事半功倍。

(据敦和基金会官方微信公众号)